

ZHONGGUO YUYANXUE

中國語學

第一輯

山東教育出版社

中國語學

ZHONGGUO YUYANXUE

第一輯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1辑/《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8-6077-7

I. 中... II. 中... III. 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686 号

中国语言学(第一辑)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4.5 印张

字 数: 36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077-7

定 价: 23.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發刊辭

值此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際
這本學術輯刊《中國語言學》
誕生了。

《中國語言學》的宗旨是以中
國語言學的優良傳統為根，取世
界語言學的精華而融通之，堅
定地走自主創新之路，為繁榮中
國語言學而奮鬥。

《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

主 编：郭锡良（北京大学）

鲁国尧（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国家语委）
陈章太（国家语委）
侯精一（社科院语言所）
胡壮麟（北京大学）
江蓝生（社科院语言所）
李维琦（湖南师大）
陆俭明（北京大学）
钱曾怡（山东大学）
孙良明（山东师大）
王 宁（北京师大）
邢福义（华中师大）
许嘉璐（北京师大）
薛凤生（美·俄亥俄州立大学）
詹伯慧（暨南大学）
宗福邦（武汉大学）

陈新雄（台湾师大）
戴庆厦（中央民大）
胡明扬（人民大学）
吉常宏（山东大学）
蒋绍愚（北京大学）
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宁继福（吉林社科院）
裘锡圭（复旦大学）
唐作藩（北京大学）
伍铁平（北京师大）
徐思益（新疆大学）
许威汉（上海师大）
曾宪通（中山大学）
赵振铎（四川大学）

编辑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董志翘（南京师大）
黄德宽（安徽大学）
李家浩（北京大学）
李小凡（北京大学）
刘晓南（南京大学）
马重奇（福建师大）
乔全生（山西大学）
宋绍年（北京大学）
孙玉文（北京大学）
汪国胜（华中师大）
吴金华（复旦大学）
杨亦鸣（徐州师大）
俞理明（四川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
张振兴（社科院语言所）

董 琨（社科院语言所）
郭芹纳（陕西师大）
蒋骥骋（湖南师大）
李建国（语文出版社）
李宇明（教育部语用所）
卢烈红（武汉大学）
潘文国（华东师大）
邵永海（北京大学）
孙建元（广西师大）
唐钰明（中山大学）
汪维辉（南京大学）
杨端志（山东大学）
殷国光（人民大学）
喻遂生（西南大学）
张涌泉（浙江大学）

编辑部主任：宋绍年 孙玉文 邵永海

《中国语言学》(第一辑)

郭锡良	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	(1)
陈新雄	郑张尚芳《〈诗经〉的古音学价值》述评·····	(11)
鲁国尧	试解“徐通锵难题”——再证“国力学术相应律”·····	(15)
聂娜	音韵学研究中 t 假设检验法献疑——与朱晓农先生商榷·····	(26)
史有为	音节结构与语法手段的相关性考察——汉语音节在语法中的地位·····	(38)
潘文国	外来语新论——关于外来语的哲学思考·····	(61)
赵振铎	《集韵》研究五十年·····	(79)
忌浮	《类聚音韵》与十六世纪赣方言·····	(85)
马重奇	闽台闽南方言诸韵书音系比较研究·····	(96)
詹伯慧	略论汉语方言研究与方言应用·····	(111)
戴庆厦 邱月	景颇语“给”字句的类型学特征·····	(118)
孙玉文	汉藏诸语言词汇比较中的词义对应问题·····	(130)
李佐丰	语法学术语的定义·····	(142)
大西克也	再论上古汉语中的“可”和“可以”——古汉语的语态试探之二·····	(149)
唐钰明	“四万八千”虚指用法探源·····	(166)
董志翘	古代文献中“今后”义的表达及其演变·····	(171)
李家浩	关于《诅楚文》“鞞鞫”的释读·····	(182)
郭芹纳	诗律与校勘·····	(189)
【笔谈】		
衍景行	汉语研究与人文精神——关于中国语言学道路的思索·····	(193)
司徒睿明	读《资中筠集》书后·····	(197)
【转载】		
姚振武	“认知语言学”思考 原载《语文研究》2007 年第 2 期·····	(199)
洪成玉	缺乏汉语史根基的所谓新观点——评《从所谓“补语”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系》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	(217)
稿约	·····	(229)

《中国语言学》(第一辑) Chinese Linguistics(The First Volume)

Guo Xiliang,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1)
Chen Xinxiong, A Review of <i>The Value of Shijing in Historical Phonology</i> by Zhengzhang Shangfang	(11)
Lu Guoyao, More 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National Powe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Xu Tongqiang’s Puzzle”	(15)
Nie Na, Can T-Hypothesis Testing Method Be Appli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A Discussion with Prof. Zhu Xiaonong	(26)
Shi Youwei,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yllabic Structure and Grammatical Means—The Status of Syllables in Chinese Grammar	(38)
Pan Wenguo, A New Thought on Foreign-based Terms—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61)
Zhao Zhenduo, Fifty Years of Study of <i>Jiyun</i> (集韵)	(79)
Ji Fu, <i>Leiju Yinyun</i> (类聚音韵) and the Gan Dialect in the 16th Century	(85)
Ma Chongq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honological Systems Reflected in Various Rhyming Dictionaries for Southern Min Dialects in Fujian and Taiwan	(96)
Zhan Bohui, Study and Usage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111)
Dai Qingxia and Qiu Yue,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Give-construction in the Jingpo Language	(118)
Sun Yuwen, Issues of Semantic Correspondence in Lexical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130)
Li Zuofeng, Definition of Grammatical Terms	(142)
Onishi Katsuya, More on 可 and 可以 in the Old Chinese—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Voice in Archaic Chinese	(149)
Tang Yuming, The Origin of the Void Reference of 四万八千	(166)
Dong Zhiqiao,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eaning “Aftertime” and Their Evolution in Ancient Literatures	(171)
Li Jiahao,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韃靼 in <i>Zuchuwen</i> (诂楚文)	(182)
Guo Qinna, Prosody and Collative Study	(189)

【Conversation】

Kan Jingxing,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Humanistic Humanity Spirit	(193)
Situ Ruiming, Notes on Collection of <i>Zizhongyunji</i> (资中筠集)	(197)

【Reprint】

Yao Zhenwu, Thought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Yuwen Yanjiu</i> , 2007. 2.	(199)
Hong Chengyu, “New Idea” Stemming from Ignoranc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A Review of From “Complement” to the Reference Frame of Grammatic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i>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i> , 2007. 4.	(217)
Notice to Contributors	(229)

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①

北京大学 郭锡良

提 要:本文作者对“汉藏诸语言构成一个语系是常识”的提法一直不赞成,为此本文分四部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第一部分根据我国的考古成果指出,人类起源单中心论和语言单源说是不可靠的。论证了黄河流域是华夏族起源、发展的摇篮和熔炉,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和长江以南的群蛮、百越都是与华夏族语言各异的不同部族,他们长期与华夏族斗争、融合,共同发展着中华文化;进而论证了羌人与华夏族并非同一部族,把吐蕃和党项论断为来自古西羌,更是缺乏根据;并指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是单独发展的西南高原文化遗址,它进化较慢,进入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也较晚。第二部分讨论了中华大地语言分化、融合的历史。指出:殷、周使用同一种语言,周朝已有雅言,秦朝实行“书同文”对语言分化有制约作用;特别是中华民族长期统一为主的国情,使得汉语只分化成几种方言,没有继续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在中华大地,语言融合反而成了主流,历代都有一些部族融合进华夏族,并自动改用华语(汉语),形成语言融合。第三部分用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和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的成果作资料,对比两个词汇系统的变化,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否定了汉语与藏缅语同源的论断。第四部分引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关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意见以及对白保罗的尖锐批评,提醒某些汉藏语比较研究者作点反思。

关键词:汉藏语系 华夏族 西羌 语言融合 孤立语 黏着语 李方桂

对汉藏诸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最早一篇作品是雷顿(J. Leyden)1808年的《论印度支那民族的语言和文学》^②,1896年孔好古(August Conrady)明确提出了印度支那语系的分类,当时的认识实际是从地域观念出发的^③;最早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汉藏语系作出论证的则是李方桂先生1937年的论文《中国的语言和方言》^④。从20世纪40年代起国内外对汉藏诸语言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原来据以提出论证的类型学的条件越来越失去作用。白保罗(Paul Benedict 保罗·本尼迪克特)1972年出版的《汉藏语概论》推动了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⑤,但他是从同源词的角度来考察系属关系的,选材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任意性,缺乏严谨的对应规律,可信程度不高。不少步白保罗后尘者,更加主观、任意,各执一端,使目前汉藏诸语言的谱系划分纷乱抵牾,莫衷一是。如何看待汉藏语系?怎样对汉藏诸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对此,学者们的意见大相径庭。有人宣扬汉藏诸语言构成一个语系已经是常识问题,我却大不以为然。

语系是从语言分化着眼的,它是以印欧语为材料建立起来的,它是否适合东方汉藏诸语言

① 本文是2007年为参加“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学术论坛”而写的。初稿、修改稿曾送各方面专家和友好审阅,承张传玺、伍铁平、李维琦、陆俭明、王宁、鲁国尧、蒋绍愚、宋绍年、李小凡、陈保亚、孙玉文、邵永海、汪锋等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多有采纳,特此致谢。

② 参看岑麒祥《普通语言学》121页。

③ 参考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见《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18页。

④ 参考徐通锵《历史语言学》47页;又,同注③,19页。

⑤ 同上51—54页;又,同注③,21页。

的实际呢？这还是一个疑点成堆的大问题。

我们看到，现在不少研究者在讨论汉藏语系及其谱系分类时，大都是同语言单源说和人类起源单中心论分不开的（参看《汉语的祖先》59页）。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类人猿和古人类化石十分丰富。它说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造成了中华大地从猿到人转变的客观条件，在这广袤的大地上，禄丰古猿、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的化石分布极广，涵盖的年代达几百万年，进化链条基本上没有缺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4页）因此，我国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一般都不相信西来说、单中心论。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说：“总之，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既不是来自中华大地的任何一方，也不是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32页）就是在西方，现代人起源于东非的单中心说也已发生动摇；因为这种被载入西方教科书几十年的“人类的祖母”“320万岁高龄的露西”这一“东边的故事”，由于在1995年古生物学家米歇尔·布吕内在乍得沙漠深处发现人猿化石阿贝耳而被质疑^①。另外，通过遗传基因研究人与人的亲缘关系固然有它的独特作用，但是要用它来解决现代人的起源，恐怕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困难。其实即使人类起源于单一中心，也不能决定语言就一定是单源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语言产生于人类发展的哪个阶段并没有确定的结论。再退一步说，即使语言产生在东非老太太走出非洲之前，可是“夏娃”在12—15万年前走出非洲，她的后裔在7—9万年前进入西亚，4万年前进入东亚和欧洲（参看《汉语的祖先》59—61页），那么欧亚两洲的现代人类分开活动都在4年以上；经过这样漫长时间的分开发展，还能是同一种语言吗？硬要把它还定作同源，试问，这在语言比较研究中又有多大价值呢？

我们无意讨论语言起源的问题，也不准备研究中国境内诸语言的系属；只想探讨一下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的真实关系，即是否真是一个语系？我们认为，语言本质上是社会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境内诸语言的关系离开了中国古代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是肯定无法弄清的。下面就从中国古代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来进行讨论。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大地在八九千年前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炎帝族和黄帝族已经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阶段，经过斗争、融合，组成了近亲的部落联盟，成为华夏族的最早核心。他们所留下来的物质文化从时间和地域上来考察，大约就是考古学上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约前5000—约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约前4300—约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约前2900—约前2000年）。这一文化经过尧、舜，传承到夏、商和西周，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互相交流，互相融合，进一步发展了华夏文化，部分蛮夷等族也融合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华夏文化向南发展至吴、楚地区；战国时期华夏文化更向巴、蜀、百越、百濮和苗、蛮地区发展，远涉湖广、川贵。秦始皇统一六国，北起长城，南到海隅，在中华大地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因此，黄河流域既是华夏族和华夏文化起源的摇篮，也是华夏族和华夏文化同其他各族及其文化融合的大熔炉。

^① 见法国《周末三日》周刊2003年9月10日一期的文章《错误的科学课程》，转述自《参考消息》2003年9月26日《教科书的错误》。

新石器时代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北面,有红山文化(约前 3500 年)。再往北,长城外还有一支细石器文化,这应该是匈奴、通古斯族祖先的遗迹,他们大都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部族,不断向西南发展,长期与华夏族发生斗争、融合,甲骨文中的鬼方、土方,周代的獫狁、东胡,汉、晋时代的匈奴、鲜卑,唐、宋时的契丹、女真,都是这一文化的后裔,他们是与华夏族同属蒙古人种而语言各异的部族。

新石器时代在南方长江流域中游和下游也有大溪文化(前 4400—前 3300 年)、屈家岭文化(前 3000—前 2600 年)和河姆渡文化(前 5000—前 4000 年)、良渚文化(前 3300—前 3000 年)。传说中的九黎、三苗,周朝的群蛮、百濮,是这些南方古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传说炎帝、黄帝与蚩尤发生过一场大战,大概就是南方九黎族向北发展与华夏族争夺中原的一种反映。九黎失败,退回长江以南,就是尧舜时的三苗和后代的苗、蛮;留在北方的部分就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了。春秋时期的百越、百濮主要应是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继承者,融合于楚。百越的语言系属与华夏族是不同的,《说苑》记载的《越人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透露出古越语与今天壮语的一定联系^①。

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是东夷族的活动范围,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氏是他的著名首领。不管他同炎帝族是否族属同源,但是自始就同华夏族邻居杂处,夏、商、周三代的九夷、淮夷、徐夷,同华夏族有和有战,不断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使华夏族在群体、文化方面都不断发展、壮大。东夷同华夏族的语言原本是否相同,很难深究,本文也已无此必要。

在华夏族的西面,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叫做“氐、羌”的游牧部落,他们同华夏族有着很多联系和交往。甲骨文中的羌方,已臣服于商。周人同羌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常常互相通婚,还联合抗商。周武王灭商,羌人就是积极的参加者。到了春秋时期,通称西戎的羌人各部,活动在河湟地区和渭水上游,有的与秦、晋杂处,晋人常联合姜戎与秦争霸。戎夏之间,融合与斗争并存。战国时,秦国日益强大,武力扩张至渭水源头,羌人的一支从河湟西迁、南徙。留在西北的羌人,汉朝初年曾臣服匈奴,后来归附汉朝,时服时叛,内迁外徙,不断与汉族斗争、融合。魏晋时汉化已经相当深的氐族苻氏大姓曾在北方建立前秦,吕光继之建立后凉,羌族姚氏大姓也建立了后秦,公元 416 年后秦被东晋所灭。从三代就已出现在西北的“氐、羌”经过两三千年的融合、斗争,除西迁、南徙的部分外,至此大致已经融合于汉族或其他北方民族。

羌人与华夏族是否同源,看法分歧。一说,炎帝姓姜,炎帝族也就是姜姓部族。炎帝族向东发展,在黄河中下游建立农耕社会定居后,留在西北继续过着游牧生活的姜姓部族就叫做羌、羌人、西羌。“羌”就是“姜”,因此羌族是与华夏族同源的。但是,这只是根据传说做出的一种推论,并非信史。《左传》记载了姜戎氏驹支对答晋国执政范宣子诘问时的一段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襄公 14 年)这里明确说明了当时(春秋时代)的羌人与华夏族既不同族属,也是不同语言的。羌人从夏、商时代就与华夏族交往,到春秋时代少说也有七八百年,关系越来越密切,不可能是分离久远造成的“言语不达”,也就是说,不是分化的结果。

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怎样对待六朝以后典籍中提到的“羌”人部落。一般都把他视同先秦的“羌”族的后裔,甚至把吐蕃(藏族)都论断为来自古代的西羌。这是缺乏坚实根据的。比如《新唐书·西域下》提到苏毗“本西羌族”、多弥“亦西羌族”(6257 页),当时多弥羌分布在今

^① 参考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初探》,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又,赵日和《闽语辨踪》,载《福建文博》1984 年第二期。

青海南部与川、藏接界的通天河一带,苏毗羌分布在多弥羌的西面;他们虽然是来自原河湟地区古羌人的后裔,然而后来“为吐蕃所并”(6275页),也就是融合到吐蕃中去了。《隋书·西域·党项传》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1845页)他们“开始活跃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89页)。《隋书》既称他为“羌”,又说是“三苗之后”,这是矛盾的;还说“皆自称猕猴种”,这又与吐蕃相同了。从党项羌出现的时间、地域和所处的社会阶段及其习俗来看,确实是与吐蕃有密切渊源而与古羌人未见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党项来说,“羌”的称谓是后人归类的泛称,并非族源专称。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菟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今(永平,公元58—75年)白狼王、唐菟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2855页)这三章诗的汉译和白狼语的汉字译音都是44句,每句4字。这就是著名的《白狼歌》。《白狼歌》的白狼语汉字译音及其汉译,经中外学者长期研究,“一般认为白狼语属藏缅语族,但究竟同哪种语言最近,则有藏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西夏语等不同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28页)。这里的白狼部落应该同《隋书·西域·党项传》所载的白狼部落是族源相同的。可以设想,青藏高原的土著白狼所属的部族不断向东发展,东汉时已经抵达川西高原阿坝地区(汶山郡),再向北发展,到隋代就抵达了河湟地区(西平)。更值得重视的是,白狼语被论证属藏缅语族,同藏语、西夏语接近,这正是党项、吐蕃关系密切的有力证据之一。

至于把藏族也认定来自古代的西羌,更是经不起史实的检验。考古资料告诉我们,西藏境内早在八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那曲、聂拉木、定日等县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物^①。《后汉书·西羌传》载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汉军大败烧当羌,“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2884—2885页)。这里的“发羌”应该是古代典籍中提到吐蕃的最早记录。同传还提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2898页)。这就是说,直到范曄写《后汉书》时期,“发羌”还同中原没有往来,怎么会与早两三千年就已活跃在陇甘的古羌人同属一个族源呢?按藏文史籍记载: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西藏地区兴起了悉补野部吐蕃,第一代赞普号鹞提悉补野,直到第七代赞普时,“尚保留着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和习俗”^②;七世纪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进行改革,统一吐蕃全境,向唐求婚,臣服于唐。因此,吐蕃和古羌人的历史少有联系。《旧唐书·吐蕃传》只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其所出也。”(5219页)可是《新唐书·吐蕃传》却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6071页)可见称吐蕃为西羌,只是后人的推测。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指出:“古羌人西迁而形成吐蕃之说,源于古汉文史籍。此说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演变,将吐蕃的形成过程,包括与其他民族同化、融合的历史简化甚至曲解,自然不是科学的论断。”(351页)我很赞同他的这个意见。

只有今天分布在四川岷江上游阿坝族自治州的羌族,一般都溯源至战国时期的南徙羌人。但是这支脱离主体的南徙羌人不能不同迁居地的原住民(大概是吐蕃的先民)交往;尤其是隋唐以后吐蕃迅速强盛,这支南徙羌人融合于吐蕃的成分也是很大的,不过还保留着原来的族称。

① 参看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和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下册)501页。

② 参看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502页。

再说,《史记》《汉书》中所谓的西南夷是对散布在云贵和川西等地众少数民族的总称。他分成农耕型和游牧型两类,农耕型民族以夜郎、滇、邛都为大,游牧型部族以僇、昆明为大。他们大都居住在高原的山地间,交通不便,秦汉以前,很少与外地交往。《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经夜郎进入滇池,后因秦并巴蜀,断了楚军的归路,于是只得“变服,从其俗”(2993页)。也就是说,这支楚军融入到当时的滇族中去了。这应该是西南地区各民族进入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之中的最早记录。它也说明,春秋时期以前这些古代的西南地区各民族是无缘同在中原活动的华夏族或羌人交往的,因为在他的北面,还隔着巴人、蜀人和吐蕃的先民。因此把西南这些古代部族也归入三代以前就活跃在河湟地区的古羌人的后裔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们知道,在云贵两省和川西不但搜集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还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如云南的元谋人、丽江人,贵州的桐梓人、兴义人,四川的资阳人)。他们的地理位置是处在长江流域南方文化遗址之间,但是实际上不少学者是把他们同西羌挂上了钩,即归进了中原文化遗址中。他们甚至把同属汉藏语系也当作了论据之一。例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汉语和藏语的近亲关系也支持了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羌人是汉藏语之间的联系环节的假设。从这个线索再推一步,我们又看到了和藏语近亲的彝语。而彝语的来源有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26页)这恐怕有陷入循环论证的危险。因此,我认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是中国境内西南高原文化遗址,它的进化较慢,进入中华民族大融合之中也较晚。这就是说,“西南夷”应是旧石器时期就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他们同说藏缅语是很自然的;不过,汉语和藏缅语同源关系的历史事实却是难以找到的。

二

语言是民族划分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正如德·索绪尔早已指出的:“认为语言相同可以断定血统相同,语言的系属同人类学的系属相吻合,那是错误的。”(《普通语言学教程》310页)他还指出,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无比重要的、唯一基本的”因素是“民族统一体”,“所谓民族统一体就是一种以宗教、文化、共同防御等等多种关系为基础的统一体”(311页)。中华民族同印欧诸民族的历史是不同的,华语(汉语)同印欧语的历史发展也是大有区别的。夏代以前的语言情况没有资料,尚难讨论;商、周的语言一致,已是大量文献资料所证实的。众所周知,周朝已有雅言、通语,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保证了汉语书面语的统一,也对方言的分化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中华民族长期统一为主的国情,使得有文字记录以来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古汉语(华语)只分化成现在的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七大方言,没有继续分化成不同的语言。这是有案可查的。

语言有分化,自然也有融合。在中华大地,语言融合的事例,从古至今,不断出现。如:殷商的鬼方据说就是周代的獫狁、汉代的匈奴,可是唐朝以后这些名称不再见于史书,哪里去了?南匈奴融合到汉族里面来了。至于北匈奴,则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以后,远徙顿河草原一带,五世纪初曾在中欧建立匈奴帝国,五世纪末就衰落下去,被融合到欧洲别的民族中去了^①。从鬼方到匈奴所说的语言,原来肯定不是汉语,在他们被融入汉族时,语言也就改用汉语了。从说“匈奴语”——说“匈汉双语”——说“汉语”,这样一个语言的取代过程,也不妨看作

^① 参看刘作奎《被汉军打败逃到欧洲——匈奴西进改变欧洲历史》,载《科学大观园》2006年9月上半月,总第266期。

是语言融合,广义的融合。又如:宋代源出鲜卑的契丹人在北方建立了辽国,稍后女真人又建立了金国,辽、金先后灭亡,南徙的契丹人、女真人与汉人杂处,大多融合到汉族中了,语言也被融合了。再如:满族本是元灭金后留在黑龙江的女真人,明朝晚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南向攻明。其子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势力日强;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十传九代,不到三百年,到现在也不到四百年,满汉已难分。虽然现在统计的满族人口还有四百多万(1982:4299159人),但能说满语的人却已经很少^①。这应该是语言融合最清楚的事例。再看移居美国的华人,一两百年间有好几百万,由于散布美国各地,也无法长期保持说汉语。华裔移民经过两三代,势必要改说美式英语。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向南发展,融合进汉族以后,其语言使用情况,大概都只能是这种结果。

南方的苗、瑶、壮、侗诸族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总的来看,汉族是向南扩张的,汉人到了南方,与土著杂处,凭借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数的优势,不断把他们融合进来,或者把他们挤到山区、边地。被挤到山区、边地的土著,虽然在大环境下也与汉人长期杂处,但保存了小聚居,因而几千年来仍然保存着原有的语言。这些语言虽然也接受了汉语的影响而有某些趋同,但是并非同源关系。如果说有同源关系,那也是在旧石器时代的事情,这里只好存而不论。

三

汉语与藏缅语族是否同源,除了从历史方面来探索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考察,即用这几种语言的现代形式来检验它。这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大家知道,汉语是孤立语,无形态变化;藏缅语是黏着语,“有一定的形态变化”,“动词的语法范畴比较丰富”(《大百科全书·民族》523页)。汉藏同源说者认为藏语比汉语的形式古老,也就是说,汉语是由黏着语变成孤立语的。那么,用汉语三千多年可考的历史来检验这个假设,不能不说,这是缺乏根据的。

我曾在《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中,根据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来考察甲骨卜辞的词汇构成情况,指出:“根据《甲骨文字典》所收近四千个义项来考察,其中所举复音结构不到一百个”,分成八类,经过分析,“这八类复音结构大多是专有名称(神名、方国名、地名、人名),又几乎全是偏正结构”(《汉语史论集》(增补本)144页),于是作出了一个结论:“殷商时代语言的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的,少数复音结构应该是词组而不是词。”(164页)我同时又作出了另一结论:“周代复音化现象十分明显,复音化的构词方式有两大类:一是多种形式的双音节的音变构词,二是多种形式的结构构词。复音化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165页)后来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和崔立斌的《〈孟子〉词类研究》两部专著,提出了更加充实的证据和论述。

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用《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作资料,对甲骨卜辞的词类做了全面、穷尽性的研究,得出《摹释总集》全部用词共1061个。其中非祭祀动词181个,祭祀动词81个,形容词11个,普通名词195个,专有名词550个,数词13个,代词7个,副词17个,语气词4个,介词2个。除名词外,全部是单音词。名词中也只有专有名词有双音结构共87个,人名(共228个)就占72个,其中妇名又占31个。如“妇好”、“妇康”,都是“妇+x”形式。国族名(共106个)双音结构15个,如“鬼方”、“人方”,“x+方”就占12个。地名(共208

^① 由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代询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教授,承告:“目前能说满语的人仅在黑龙江的一些满族村屯及市、县,约百人,其中说得好的有十八位老人,年龄都在八十岁以上。”

个)双音结构6个,如“有师”、“丘商”、“密山”、“黄林”等。宫室名、星名等(共8个)双音结构5个:东寝、西寝、东室、南室、鸟星。《摹释总集》收甲骨五万多片,刻辞内容涉及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泛,足以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这有力地证实了甲骨文单音节性质的特点。

崔立斌的《〈孟子〉词类研究》全面研究了《孟子》的词类,根据他研究的统计:“《孟子》一书共有2886个词,其中有单音词2562个,占88.8%;双音词300个,三音词24个。《孟子》中只有动词、形容词、名词有复音词,其他类词只有单音词,没有复音词。”(1—2页)具体情况是:不及物行为动词(95个)中有双音词19个,如“驰驱”、“号泣”、“交际”、“匍匐”、“沐浴”、“田猎”、“巡狩”、“斋戒”等(34页);及物行为动词(505个)中有双音词12个,如“尝试”、“雕琢”、“颠覆”、“扶持”、“祭祀”、“选择”等(40—58页);不及物状态动词(185个)中有双音词17个,如“充实”、“泛滥”、“荒芜”、“觳觫”、“流连”、“龙断”、“憔悴”、“死亡”等(38—39页);及物状态动词(46个)中有双音词2个:“充塞”、“曾益”(66页);心理动词(34个)中有双音词4个:“恻隐”、“怵惕”、“恭敬”、“般乐”(36页);感知动词(131个)中有双音词3个:“忖度”、“讴歌”、“以为”(“认为”)(62—65页);能愿动词(10个)中有双音词2个:“可以”、“足以”(77—78页);性质形容词(225个)中有双音词11个,如“颁白”、“空乏”、“糜烂”、“忸怩”等(94—97页);状态形容词(89个)中有双音词47个,如“茁壮”、“迟迟”、“昏昏”、“源源”、“勃然”、“浩然”、“填然”、“蹴尔”、“跃如”、“赫斯”等,还有三音词24个,如“纷纷然”、“芒芒然”、“荡荡乎”、“皇皇如”、“洋洋焉”等(97—100页)。《孟子》使用名词1269个,有双音词182个。具体情况是:人物名词(201个)中有双音词88个,如“君子”、“小人”、“先生”、“弟子”、“天子”、“庶人”等(113—117页);动物名词(46个)中有双音词3个:“凤凰”、“鸿鹄”、“麒麟”(117页);国家名词(5个)中有双音词3个:“天下”、“四海”、“国家”(118页);事物名词(318个)中有双音词31个,如“草莽”、“典籍”、“光辉”、“四体”、“五音”等(120—121页);处所名词(127个)中有双音词24个,如“道路”、“宫室”、“丘陵”、“中国”、“宗庙”等(122—123页);抽象名词(111个)中有双音词8个,如“功烈”、“礼貌”、“世俗”、“条理”等(124页);时间词(44个)中有双音词9个,如“今日”、“平旦”、“斯须”、“中古”等(129页)。专有名词(402个)包括人名、地名和书名,自然有不少双音词,如“仲尼”、“子夏”、“北海”、“箕山”、“《春秋》”、“《汤誓》”等,还有一些三音词,如“北宫黝”、“薛居州”、“公孙丑”等(125—128页)。

从甲骨刻辞到《孟子》成书,相隔大约八九百年,仅以杨逢彬和崔立斌的研究成果作比较,就足以说明这期间汉语词汇系统变化巨大。概括起来,有三大变化:

(一) 汉语已由纯粹的单音词变成单音词与双音词相结合的语言。不少学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是汉语复音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此时汉语的复音词大概超过了20%。

(二) 词类系统有重大发展。根据杨逢彬的研究,甲骨刻辞中只有12个单音节的性质形容词(幽、黄、黑、白、赤、大、小、多、少、新、旧、高),没有状态形容词;只有2个单音节介词(于、自),没有连词。我在《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中曾采用陈梦家、管燮初两先生的意见,把“又、有、累、及、乍(则)、若”六个词列作连词,这里应该改从杨逢彬的意见。杨逢彬在他专著的《副词》一章中附带讨论了四个语气词“惠、佳、抑、执”;拙文是把“惠、佳”列作语气副词,不同意把“抑、执”看作句尾语气词。我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杨逢彬有关语气词的看法不可取。现在用我们认识的甲骨文词类系统来对比崔立斌所分析的《孟子》的词类系统,变化发展最大的有两点:一是产生了两类新虚词“连词”和“语气词”;二是形容词和介词也有巨大变化。形容词的变化,首先是产生了一类新的状态形容词,其次是性质形容词也由意义局限很窄的12个词扩展为意义范围十分广泛的225个。介词由“于、自”2个增加到13个(“於、于、乎、焉、以、为、

与、自、由、从、及、诸、当”^①),不但介词数量增加,所表示的语法作用、语法意义也明显扩展。甲骨文中介词只引介地点、时间和动作涉及的对象,到了《孟子》时,还能引介工具、方式、原因、目的。

(三) 汉语构词法已由词义构词和单音节的音变构词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为双音节的音变构词和多形式的结构构词相结合的方式。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古今汉语都是孤立语,这是共识;但是春秋、战国以后附加式构词法构成的新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汉语的孤立语性质确实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例如“油然”、“跃如”、“赫斯”、“巍巍然”,都是词根+词尾(构词后缀),词尾就是黏着性的成分。特别是中古以后,“的”、“地”、“得”和“了”、“着”、“过”的产生,还不只是牵涉到词尾的问题,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的:“‘了’字表示完成貌,‘着’字表示进行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词尾,而是‘形尾’,因为不是构词法的问题,而是形态变化的问题。”^②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不妨承认汉语发展的趋势有向黏着变化的迹象,这不正是同汉藏语同源说者的假设背道而驰吗?总之,汉语从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来看,是完全不支持他们的假设的。

当然,他们还可以改变说法,做出另一种假设,即藏缅语比汉语发展快,那么藏缅语就是由孤立语变成黏着语的。如此一来,汉藏语比较研究就要来个彻底改变。能否行得通,恐怕谁也很难说。

四

怎样看待汉藏语系?怎样做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近些年来汉语古音学研究争论的中心问题。我在《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中讨论汉藏语比较时,除了批评梅祖麟、潘悟云、郑张尚芳的错误外,还引用了李方桂先生、张琨先生和俞敏先生的意见来说明问题。李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原则、概括,竟然招来了某人的诘问。他借口李方桂先生与张琨先生对汉藏语系的态度有所不同,居然看不出两位先生的态度、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从而质问我“到底听谁的”?现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出版了,在这个问题上他谈了很多意见,也更加具体、明确。为了更好地弄清是非,我决定把李先生在《口述史》中的话引得多一点、全一点。首先,在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导原则和方法论时,李先生讲了三意见:

(一) 汉藏语是不是一个语系?他说:“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仍处在相当低级的阶段。这些语言是否有系属关系至今还是问题。”(104页)

(二) “归根结底,我认为,要判定语言之间是不是发生学上的关系,必须采用几种标准。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间可以有许许多多相似特征,而一门非发生学关系的语言是不会具备这么多相似特征的。然而,它们也可具有某些(少数)相似特征,但仅仅凭此无法说明它们一定具有发生学关系。”(106页)

(三) “我认为自己对某门语言与另一些语言的联系这个问题并不十分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发现那些语言中的结构(规律)。研究一门语言,又再研究别的语言,这样,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最终会冒出来。在未把相互有关的语言都弄清楚之前,不值得费尽心机去

^① “於、于、乎、诸”可以合并。

^② 见《汉语语法史》120页,《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过早地做比较工作。”(107页)“我只想知道这门语言的面貌如何,是否把它与别的语言联系起来,那是最次要的问题。”(108页)

在如何看待汉藏语的系属、如何划分语言的系属及如何研究民族语言等问题上,郑张尚芳、潘悟云等人的看法和做法都与李先生这里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

李先生对白保罗(保罗·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做出了尖锐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对我国目前这方面的现状,也许更有针对性,不妨摘引一些段落:

(一)“我认为那不能称之为方法论,根本不能成其为方法论。那仅仅是,——他(按,指白保罗,下同)——你们都知道,他读过许多词典。他是读过许多词典,并从词典里抽出了大量的词汇等等。但是,他的确很聪明,确实是个精明人。但在方法论上我不赞赏,因而我从不对我的学生引用他的话。我认为他的方法论让人误入歧途。”(93页)

(二)“众所周知,他至今还在研究各种不同的语言。你们知道,他使用所有的词典,从中抽出许多词汇来,编出了他那本书——叫什么来着?(罗:他主要有两本著作:《汉藏语言概论》和《澳泰语言与文化》。)”(94页)“对,他肯下功夫,把许多东西拼凑在一起,不管对错,然后就开始写书。(笑了)因此,大人物都得下苦功夫。”(94页)“嗯,我以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95页)

(三)“是这样,他说:‘啊,这是这样构拟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构拟,无人去深究。既然本尼迪克特这样构拟,好吧,这就是圣经,这太可悲了。”(95页)

第一次念到这些段落时,我不禁想到:李先生的话似乎都是对着郑张、潘悟云这些人说的。我翻看他们的著作时,常常会冒出一个想法:这样做是要贻误青年的;这就是李先生说的“让人误入歧途”。我看了梅祖麟、潘悟云等靠翻字典弄出的同源词时,还只敢就事论事,一个一个指出错误,总结成三隔(音隔、义隔、类隔)现象。哪里比得上李先生斩钉截铁的结论:“此类构拟纯属胡闹。”这才是一针见血。梅、潘等的汉藏比较构拟完全跟着白保罗亦步亦趋,真的把白保罗的纯属胡闹的构拟当成“圣经”了。李先生说:“这太可悲了。”可惜,处在可悲境地的人却偏偏还趾高气扬。

从2002年我就古音问题驳梅祖麟的言论开始,他们一直就要把我塑造成汉藏语比较的反对派。请问,我什么时候反对过汉藏语比较呢?我在2002年《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当然,我们也希望汉藏语比较研究能尽快建立在语音对应规律的稳固基础之上。”(465页)在那里我反对的实际就是李方桂先生批评的“纯属胡闹”的汉藏语比较,我反对的是比照藏语来构拟上古音系。其实只要不轻易地作出语言系属的结论,连汉英语言类型的全面比较,我也不反对。我在2003年《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中又指出:“汉语和藏语从分化到有文献的古藏语,据最短的估计也在三千年以上”,它同汉语上古音不可能相近,比照古藏语来构拟汉语上古音是很错误的(491—492页)。我的这些意见错在哪里呢?他们无力反驳,有的就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北大落后了”;或者说,“北大不搞汉藏语比较,没有出路”;有的就装作充耳不闻,继续我行我素。比如,郑张尚芳2003年出版了他的《上古音系》,附录了他“以沈兼士《广韵声系》为基础”而做成的收字一万八千的《古音字表》。《广韵声系》是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但是拿它“作基础”来编《古音字表》,恐怕要算音韵学研究者的常识性错误。我在2003年的文章中就对郑张的古音系统作过比较全面、系统的批评,从材料论据到理论方法,都有扼要的解剖分析。我的总结性评语是,郑张的填空白式的古音系统“既不合诗文押韵,又必然乱了谐声系统。因此这个‘上古六元音系统’的古音体系既是建立在沙滩上,又是自相矛盾的”(499页)。现在看来,李方桂先生“此类构拟纯属胡闹”的批评,似乎比我更直率中肯。

《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对怎样看待汉藏语系、怎样研究汉藏诸语言,有很明确、中肯的意见。他指出:首先要把一门一门语言研究好,才谈得上比较;要重视发现语言材料的结构规律,包括口语和文献。这也就是说,要搞唯物主义,要实事求是;不要凭印象,不要主观拼凑。至于汉语,它是一种保存了三千多年丰富文献的语言,从甲骨文到今天,是有据可查的。研究这三千多年的汉语史、汉语语音史,不把文献资料的考证摆在第一位,视我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如敝屣,侈谈什么新理论、新材料,想靠汉藏比较来打天下,这恐怕也难逃李先生的批评吧。

参考文献:

- 费孝通等(198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王钟翰主编(1994)《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萧君和主编(2001)《中华民族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王文光(2005)《中国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
-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1996)《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
-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 (唐)长孙无忌《隋书》,中华书局,1973。
-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5。
- 岑麒祥(1957)《普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
- 孙宏升、江荻(1999)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徐通锵(1991)《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 李方桂(2003)《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 王士元主编(2005)《汉语的祖先》(李葆嘉主译),中华书局。
- 郭锡良(2005)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载《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 郭锡良(2005)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 郭锡良(2005)音韵问题答梅祖麟,载《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 杨逢彬(2003)《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花城出版社。
- 崔立斌(2004)《〈孟子〉词类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张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年7月13日初稿,12月13日修改

2008年1月13日定稿于京郊守拙居